

美国口述历史伦理审查机制研究

杨祥银

【提要】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以人为对象的研究”中,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关注和规范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伦理审查与监管机制。而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主要基于活生生的当事人与目击者口述回忆的互动性访谈的方法与研究领域,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它也不断受到这套原本以生物医学与行为研究为主要导向的伦理审查制度的监管与制约。与此同时,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也一直以违背口述历史基本原则与侵犯学术自由为理由而要求改革口述历史伦理审查机制,并极力主张将口述历史直接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不过,在实际运作中,由于联邦法规与政策的模糊性以及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风险规避思维,美国绝大部分大学和研究机构仍然要求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排除对口述历史的伦理审查或采取何种类型的审查模式。

【关键词】 口述历史 伦理审查 伦理审查委员会

自 1948 年美国现代口述史学诞生以来,经过几代口述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其发展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已经成为一种记录、保存、传播与解释过去美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乃至日常生活等领域的不同参与者的声音与历史记忆的重要方法与研究领域。在过去六十多年间,尽管美国口述史学呈现迅速发展,不过仍然只有少数报告的法院案例涉及法律与伦理问题。^① 可是,随着口述历史日益关注和重视战争与冲突、自然灾害、犯罪、非法移民、特殊疾病、毒品与多元性取向等具有当代性、敏感性与隐私性的议题,同时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资料的网络传播与使用变得更为容易与便捷,这些因素使得口述历史工作面临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

正是如此,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口述历史工作也逐渐成为所在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的审查与监管对象。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口述历史伦理审查历史的回顾来考察口述历史学界要求改革审查制度的主要诉求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②

^① John A. Neuenschwander, *A Guide to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edition, 2014, p. xiii.

^② 相关研究可参阅 Rachel Vagts, “Clashing Discipline: Oral History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Archival Issues*, Vol. 26, No. 2, 2002, pp. 145 - 152; Linda Shopes, “Oral History, Human Subjects,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2009; Zachary M. Schrag, *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 - 2009*,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8 - 148, 152 - 159; Martin Meeker, “The Berkeley Compromise: Oral History, Human Subjects, and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in Claire Bond Potter and Renee C. Romano, eds., *Doing Recent History: On Privacy, Copyright, Video Gam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ctivist Scholarship, and History that Talks Back*,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12, pp. 115 - 138;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ird edition, 2014, pp. 227 - 233.

一、“伦理帝国主义”：美国伦理审查机制的起源与扩张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纳粹人体实验与持续长达 40 年的美国塔斯基吉梅毒试验 (Tuskegee Syphilis Experiment) 等人体试验丑闻事件的不断曝光 , 同时也因为 1947 年《纽伦堡公约》 (The Nuremberg Code) 与 1964 年《赫尔辛基宣言》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等重要文件的影响 , 美国学术界、公众与政府不断关注与重视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① 关于“以人为对象的研究”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 美国联邦政府就开始制定并颁布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规来规范研究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 并形成一套集监管法规、监管机构、监管程序和监管内容为一体的较为完善的伦理审查与监管体制。

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官方网站资料显示 , 目前 , 美国大部分“以人为对象的研究”的监管法律是由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下属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 (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 OHRP) 负责监督与实施的《美国联邦法规》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第 45 章第 46 部分 (以下简称 45 CFR 46) 。^② 45 CFR 46 最早由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 Education and Welfare) 于 1974 年颁布 , 目前生效并实施的法规于 2009 年修改 , 该法规包括五个部分 , 其中 Subpart A 部分被称为“人类受试者保护联邦政策” (Federal Policy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 同时从 1991 年开始该部分也被习惯称为“共同规则” (Common Rule) 。^③

目前,“共同规则”被包括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和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在内的 18 个联邦机构所采纳。简言之,所有由联邦机构执行或受其经费资助的“以人为对象的研究”都必须遵守此项规定,具体工作则由各机构(主要是大学与科研机构)所属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负责实施,由其决定是否批准研究或要求修改研究方案或拒绝批准研究。当然,“共同规则”明确强调伦理审查委员会在实质审查之前,首先需要认定该计划是否符合法律上的“研究”定义。而所谓“研究”则是指“旨在发展或有助于获得普遍性知识而进行的一种系统性调查,包括研究发展、测试和评估”。而“人类受试者”是指“研究者所研究的具有生命的个体 (living individual) , 研究者 (无论是专业人士或学生) 通过对其干预或与之互动而获得资料或可识别的私人信息”。^④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大部分研究机构为避免伦理危机或法律风险,都会要求该机构内那些并未获得联邦资助的研究计划同样接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管。^⑤ 同时,这项主要适用于生物医学和行为研究伦理规范的联邦法规也不断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扩张,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包括学生)在从事“以人为对象的研究”时都必须合乎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规范要求,当然也随之引起众多学者的质

① Susan K. Grove , Nancy Burns and Jennifer R. Gray , *The Practice of Nursing Research: Appraisal , Synthesis , and Generation of Evidence* , Saunders/Elsevier , 2013 , pp. 159 - 163 .

② 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创建于 2000 年 , 其前身是成立于 1974 年的研究风险保护办公室 (Office for Protection from Research Risks) , 当时隶属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

③ 具体内容访问 <http://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45cfr46.html> [2015 - 07 - 28] 。

④ 详细内容参阅“45 CFR 46. 102 (2009) ” (<http://www.hhs.gov/ohrp/humansubjects/guidance/45cfr46.html#46.102> [2015 - 07 - 28]) 。

⑤ Richard A. Shweder , “Protecting Human Subjects and Preserving Academic Freedom: Prospec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American Ethnologist* , Vol. 33 , No. 4 , 2006 , pp. 507 - 508 .

疑与批评。

概括而言,对于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运作弊端的批评与争议主要体现在基本原则与技术层面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诸多组织和学者质疑有关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联邦法规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研究者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以及思想与研究(学术)自由。^①其中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最具代表性,该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发布系列报告批评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学术自由的影响与侵犯,并极力主张改革或豁免某些研究类型的伦理审查与监管。而针对技术层面的批评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由于需要遵守特定的审查程序,因而较容易出现扼杀研究创新性的可能性;(2)由于联邦法规所规定的“研究”定义很难明确界定,因而经常引发伦理审查委员会与研究者在判定提议的研究计划是否属于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范畴这个问题上产生冲突与争执;(3)当出现违反相关法规的情况时,到底应该履行怎样的程序和负担怎样的法律责任以及最终的法律责任归属等问题都不清楚;(4)由于审查规范趋于严格以及审查延宕,因而极容易影响研究成果的产出效率;(5)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成员由临床与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他们经常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审查施加诸多不合理要求。^②

上述联邦法规适用范围的过度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弊端与消极影响,使得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成为备受质疑与批评的主要目标,甚至机构和学者将这种伦理规范的过度审查与监管称为“任务蠕变”(mission creep)和“伦理帝国主义”(ethical imperialism)。^③

二、从“快速审查”到“排除审查”:美国口述历史学界的改革努力^④

同其他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口述历史作为一种主要基于活生生的事件当事人与目击者口述回忆的互动性访谈方法与研究领域,它自然也逐渐成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对象。从现有资料显示,美国口述历史学界有关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讨论的最早记录可能是在1988年,当时有

① Philip Hamburger, “The New Censorship: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The Supreme Court Review*, Vol. 2004, 2004, pp. 271 - 354; William G. Tierney and Zoë Blumberg Corwin, “The Tensions Between Academic Freedom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Qualitative Inquiry*, Vol. 13, No. 3, 2007, pp. 388 - 398.

② Caroline H. Bledsoe, Bruce Sherin, Adam G. Galinsky, Nathalia M. Headley, Carol A. Heimer, Erik Kjedaard, James Lindgren, John D. Miller, Michael E. Roloff and David H. Uttal, “Regulating Creativity: Research and Survival in the IRB Iron Cag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1, No. 2, 2007, pp. 593 - 641.

③ University of Illinois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mproving the System for Protecting Subjects: Counteracting IRB Mission Cree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LE06 - 016, 2005; Zachary M. Schrag, *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 - 2009*.

④ 就审查类型而言,伦理审查委员会以目前实施的45 CFR 46 (2009)为依据并根据研究活动所涉及的风险程度高低将其分为“豁免审查”(exempt review)、“快速审查”(expedited review)和“一般审查”(又名全体委员会审查,full-board or full-committee review)。“豁免审查”的研究计划一般是属于风险程度极低或零风险,不过它们仍然需要接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并进行登记。而那些风险程度低于最低风险(minimal risk)的研究计划或已获得IRB批准并且研究方案仅有微小变化的研究计划则适用于“快速审查”。上述两种审查类型可以由伦理审查委员会主席单独审查或由主席指定一名或多名富有经验的委员进行审查。那些不符合豁免和快速审查类型或风险程度高于最低风险的研究计划则需要进行一般审查,即由伦理审查委员会召集法定到会人数对研究计划进行审查。而至于“豁免审查”与“排除审查”(excluded review)之间的区别,美国历史协会曾经做出说明,即如果一个口述历史计划符合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该计划可能会被豁免审查,不过必须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申请并由其根据“共同规则”所规定的豁免类型来决定是否豁免。而“排除审查”是指如果研究者认为一个口述历史计划符合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他们可以无需咨询伦理审查委员会而直接启动计划。详细参阅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olicy Statement”, 10 November, 2003.

一位大学教授询问时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执行秘书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Candida Smith)如何评论他所在大学发布的有关口述历史研究计划需要接受伦理审查的监管指南。不过,史密斯拒绝直接评论伦理审查问题本身,他更关注的是诸如此类的审查标准是否符合最佳的专业原则。^①

当然,总体而言,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前,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度对口述历史研究计划的审查与监管还不是那么普遍与严格,甚至大部分口述历史工作者都没有意识到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存在。^②不过,发生在1995年的一件针对口述历史访谈伦理审查问题的事件令美国口述史学界真正意识到伦理审查委员会对他们工作的影响。当时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拒绝接受该校历史系一位研究生提交的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因为该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所使用的部分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并未事先经过该校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尽管该研究生最终获得审查委员会追加的豁免证明和她的博士学位,不过该事件却引发了美国口述史学界对伦理审查制度的激烈争论与深刻反思。^③

同时,随着美国伦理审查制度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急剧扩张,该制度的弊端给口述历史工作者带来越来越多的挑战与困难。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在正式进行口述历史计划之前,研究者被要求向他们所在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提交该计划的研究方案,其中包括详细的访谈提纲;而且还要求研究者参加有关伦理规范的繁琐培训和填写大量表格。同时,伦理审查委员会还提出一系列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受访者保持匿名(即使受访者同意公开),等等。^④这些要求与限制条件显然与口述历史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背道而驰,正是如此,口述历史学家也日益关注和担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过度审查与监管会对口述历史产生“寒蝉效应”,甚至侵犯他们的学术自由。^⑤

如上所述,发生于1995年的特拉华大学博士论文事件引发了美国口述史学界对伦理审查问题的激烈争论和担忧。在1996年秋冬之际,研究风险保护办公室和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议修改美国历史协会于1989年5月采纳的《为历史记录所做访谈的声明》(*Statement on Interviewing for Historical Documentation*)。新增内容旨在警告历史学家,如果在他们的研究中涉及以人为对象的访谈方法,他们必须遵守相关的联邦法规。^⑥基于此,美国历史协会和口述历史协会建议历史学家应当了解和遵守所有适用于他们的研究活动的法律、条例和机构政策。^⑦不过,大部分历史学家(尤其是口述历史学家)仍然认为基于生物医学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制度并不适用于他们的研究工作。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历史协会和口述历史协会等历史学组织与一些著名口述历史学家就积极与联邦政府主管人类受试者保护的机构进行磋商和斡旋,希望推动口述历史伦理审查制度的改革,主张应该将口述历史直接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这种努力始于1997年,当年9月三位口述历史学家史密斯、琳达·肖普斯(Linda Shopes)和霍华德·格林(Howard Green)与时任研究风险

① Richard Candida Smith, "From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22, No. 4, 1988, p. 5. 需要指出的是,该期通讯将出版日期错写为1989年。

② Robert B. Townsend, "Ethical Imperialism: A Conversation with Zachary Schrag",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April, 2011.

③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p. 228.

④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tecting Human Being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cademe*, Vol. 87, No. 3, 2001, p. 57.

⑤ Linda Shope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Oral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September, 2000; Jennifer Howard, "Oral History Under Review",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10, 2006.

⑥ Michael A. Gordon, "Historians and Review Boards",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September, 1997.

⑦ Richard Candida Smith, "Council Considers Proposed Human Subjects Guideline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1, No. 2, 1997, p. 12.

保护办公室主任加里·埃利斯(Gary B. Ellis)以及托马斯·帕古里斯(Thomas Puglisi)和米歇尔·拉塞尔-艾因霍恩(Michele Russell-Einhorn)两位官员举行会晤。在这次被肖普斯称为“友善的和非正式的”会晤中,帕古里斯认为口述历史协会的《评估指南》与监管人类受试者研究的联邦法规并非是不相容的。不过,联邦官员进一步建议在开始可能包括口述历史访谈的任何研究之前,历史学家应当联系他们所在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以了解和咨询有关人类受试者研究所涉及的政策和条例。在此次会晤的最后,埃利斯向三位透露说他们的办公室正准备修改符合“快速审查”的那些属于最低风险的研究类型目录,他还建议他们推荐口述历史纳入这个目录当中。

随后,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决定修改有关人类受试者研究的监管条例。1997年11月,研究风险保护办公室就扩展符合“快速审查”的研究类型的提议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其中跟口述历史相关的书面意见共有六份。在这六份书面意见中,其中一份由美国口述历史协会起草并获得美国历史协会、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和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赞同,意见起草负责人肖普斯认为新条例正确地假设大部分口述历史计划对于受访者来说只是包含最低风险,因此可能有助于确保伦理审查委员会无需根据主要针对医学和行为科学研究的标准来审查口述历史计划。1998年11月,新规则正式将口述历史纳入“快速审查”的研究类型,这项政策被认为是联邦政府有关口述历史伦理审查与监管的第一次明确阐述。它的颁布也引起历史学界的积极回应,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前主席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指出,任何遵循口述历史协会《评估指南》的口述历史学家应该不会太难满足研究风险保护办公室或他们所在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要求。^①当然,也有历史学家表示反对,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尼尔·朱蒙维拉(Neil Jumonville)就认为美国历史协会等组织在有关历史研究伦理审查问题上的顺从态度(包括同意将口述历史列入“快速审查”研究类型)是相当令人不安的,(过分监管)所造成的最糟糕影响可能会像麦卡锡主义那样。^②

尽管1998年的联邦规则将口述历史纳入“快速审查”的研究类型,但这并未缓和史学界对口述历史伦理审查制度的不满与激烈抨击。^③历史学界开始通过与相关组织和个人的合作转而寻求如何让口述历史排除在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之外。2000年8月,肖普斯与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同国会议员戴安娜·德格特(Diana DeGette)的工作人员进行会面,当时德格特正在起草一份旨在修改人类受试者保护联邦法规的议案,而目标就是尽可能明确地将口述历史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同年11月,时任美国社会学协会执行主任菲利斯·莱文(Felice Levine)也倾向于赞同这种做法,并且暗示诸如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相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应该更少接受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管。^④这种排除审查策略的核心思路就是希望主管机构能够相信包括口述历史在内的历史研究并不是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

① Rebecca Sharpless, Sandria Freitag and Armita Jones, “Memo on Review of Oral History Based Research Projects”, March, 1998. “OHA Involved in New Rules Affecting Academic Oral Historian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3, No. 1, 1999, p. 3.

② Christopher Shea, “Don’t Talk to the Humans: The Crackdown 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ingua Franca: The Review of Academic Life*, Vol. 10, No. 6, 2000, p. 27.

③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 “Protecting Human Beings: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pp. 55–67. “Oral Historians Asked about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4, No. 1, 2000, p. 3; Donald Ritchi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5, No. 3, 2001, p. 4; Linda Shopes, “Historians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 Updat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October, 2001; “Panelists Defend, Criticize Campus IRB Proces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5, No. 4, 2001, pp. 6–7.

④ 转引自 Zachary M. Schrag, *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2009*, p. 154.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经过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的内部交流以及与相关联邦部门的积极沟通,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终于取得重大进展。2003年8月26日,肖普斯和里奇起草一份政策声明,主要指大多数口述历史访谈计划可以排除在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范围之外。令人意想不到的,在2003年9月22日给肖普斯和里奇的信件中,时任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监管事务副主任的迈克尔·卡罗姆表示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不过部分表述需要修改。修改后的政策声明指出“大多数口述历史访谈计划不受制于45 CFR part 46 subpart A中所规定的健康与人类服务部的人类受试者保护条例的要求,可以排除在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之外,因为它们并不包含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条例所定义的‘研究’。……其主要理由是口述历史访谈一般而言不是为了有助于获得‘普遍性知识’,它们不受制于45 CFR part 46中所规定的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条例的要求,因而能够被伦理委员会排除在审查之外。……尽管历史学家追求超越他们的特定研究对象的意义,不过不像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者,他们不是追求历史或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他们也不是追求具有预见价值和能够被应用于其他条件(目的是为了控制结果)的根本原则或自然法则。历史学家解释一种特定的过去;他们不是为了得出有关发生在过去的全部内容的普遍解释,他们也不是预测未来。”^①对于这项政策声明,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教育与发展部的乔治·波斯皮斯尔(George Pospisil)还予以再次重申。尽管上述政策声明所增加的“一般而言”这个术语为后续的政策解释与执行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卡罗姆还强调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赞同只是代表健康与人类服务部而不能代表同样采纳“共同规则”的其他联邦机构;但是对于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来说,这项政策声明显然是它们多年努力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它们在其各自官方通讯上都打出相同标题——《口述历史排除在伦理委员会审查之外》。^②

不过,对于这项政策声明的具体实施来说,其真正阻力来自各个机构的伦理审查委员会。2013年10月30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受试者保护办公室发布了一项有关口述历史、定性访谈(qualitative interviews)与人类受试者研究的备忘录,其内容是与卡罗姆共同讨论的。该备忘录首先确认“由口述历史代表向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描述的口述历史活动一般而言是为了创建一种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录,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不是为了有助于获得普遍性知识。”但是,该备忘录继续通过三个假设性口述历史计划来解释与评估口述历史活动是否需要接受伦理审查的三个一般原则。第一个原则指出“只记录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或个人经历而不是为了得出结论或总结发现结果的口述历史活动(诸如开放式访谈)将不构成45 CFR 46所定义的‘研究’。”而所举的例子则是一个与大屠杀幸存者进行访谈的口述历史录影,其目的是可供在大屠杀博物馆观看。该录影带的创建不是为了得出结论、为决策提供信息或总结发现结果,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创建一种与大屠杀相关的特定的个人事件与经历的历史记录,并且为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一种讲述他们故事的渠道。第二个原则强调包括开放式访谈在内的旨在发展或有助于获得普遍性知识的系统性调查将构成45 CFR 46所定义的“研究”,所举例子是一个有关海湾战争幸存老兵的开放式访谈,其目的是为了记录他们的经历与得出有关他们经历的结论、为决策提供信息或总结发现结果。第三个原则指出“为了给其他研究者提

① “Applicat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Regulation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at 45 CFR Part 46, Subpart A to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7, No. 3, 2003, p. 3.

② Donald A. Ritchie and Linda Shopes, “Oral History Excluded from IRB Review”,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7, No. 3, 2003, p. 1; Bruce Craig, “Oral History Excluded from IRB Revi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December, 2003.

供资源,口述历史学家和定性调查者可能会创建档案馆。由于档案馆的目的是为从事 45 CFR 46 所定义的‘研究’的其他研究者创建信息库,那么诸如此类的档案馆的创建将构成 45 CFR 46 所定义的‘研究’。”针对该原则所提供的例子是一个有关黑人棒球联盟(Negro League Baseball)健在球员的系列开放式访谈的研究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未来的研究创建档案馆。而诸如此类的档案馆的创建将构成 45 CFR 46 所定义的‘研究’,因为其目的是为未来的研究收集资料。最后,该备忘录还指出附在卡罗姆 2003 年 9 月 22 日信件中的 2003 年 8 月 26 日的政策声明并非由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起草,因而并不能成为它的政策指南。备忘录还强调政策声明中第三段关于口述历史活动特征的描述无法提供足够的理由让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决定口述历史活动一般而言不包含 45 CFR 46 所定义的研究。^①

就这样,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花了多年努力并经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确认的大多数口述历史访谈计划排除审查的政策声明又被卡罗姆所否认,而且他在 2003 年 12 月 1 日给北伊利诺伊大学研究合规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Compliance)的萝莉·布罗斯(Lori Bross)解释有关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的电子邮件中还附上了上述备忘录,并且明确表示这份备忘录是与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共同讨论的。^②显然,上述做法已经对 2003 年 9 月 22 日的政策声明造成严重影响,导致越来越多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开始质疑政策声明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此,2004 年 1 月 7 日,肖普斯和里奇参加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召集的电话会议,卡罗姆重申他所在的机构继续赞同 2003 年 9 月 22 日的政策声明。而在 2004 年 1 月 8 日给他们的电子邮件中,他还表示“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一贯设法确认这个赞同意见,无论何时它收到来自伦理审查委员会代表或其他机构官员有关这个问题的询问。”^③在 2004 年春季出版的《口述历史协会通讯》上,肖普斯和里奇强调造成上述政策声明解读困惑的主要原因在于对“研究”和“普遍性知识”两个概念的理解差异,他们指出“尽管口述历史明显包含有助于概括(generalizations)的历史研究与访谈,但是口述历史学家的标准操作程序并不符合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获得叙述者知情同意并量身定制的访谈并不符合这种‘研究’定义;它们也并不有助于获得‘普遍性知识’,即使受访者是那些来自一个共同体或经历共同主题或事件的人,不管访谈者或其他研究者是否可能从众多访谈中得出某些历史概括。”^④随后,在 2004 年 6 月 5 日的会议上,美国历史协会理事会再次重申它们支持 2003 年 9 月 22 日的政策声明,并指出:“我们强烈要求这项政策被所有伦理审查委员会采纳,以确保执行全国一致的政策,这将使历史学家能够追求这项重要的研究方法,而没有不必要的限制。”^⑤

然而,口述历史伦理审查政策的解读与具体实施仍然相当混乱,正如 2004 年 12 月出版的《历史视野》中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尽管部分大学已经采纳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立场,一般而言已经将口述历史访谈排除在伦理委员会审查之外。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机构却倾向于支持加州大学

① Office for Protection of Research Subjec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Memorandum: Outline of October 30, 2002 Discussion with Dr. Michael Carome, Associate Directors, HHS-OHRP, Regarding Oral History,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Human Subjects Research”.

② Michael Carome’s E-mail to Lori Bross, December 1, 2003.

③ Linda Shopes and Donald Ritchie, “Exclusion of Oral History from IRB Reviews: An Updat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March, 2004.

④ Donald A. Ritchie and Linda Shopes, “An Update: Excluding Oral History from IRB Review”,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38, No. 1, 2004, p. 1.

⑤ AHA Staff, “AHA Council Reaffirms Position on Oral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September, 2004.

洛杉矶分校备忘录所建议的更为保守的政策;当然也仍然有其他机构对于该问题保持沉默,因而进一步加剧政策的总体模糊性。时任美国历史协会副主席(负责研究部)的罗伊·罗森茨维格(Roy Rosenzweig)指出“我们对于某些伦理审查委员会没有遵守美国历史协会与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协议感到相当困惑。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让我们的会员意识到某些大学仍然坚持对口述历史进行伦理委员会审查。”^①而2005年一项由美国历史协会所做的调查报告进一步显示2003年9月22日的政策声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积极影响,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不认可其法律效力。^②正是由于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在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上的相互冲突与矛盾的立场,使该声明的实施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方面,口述历史工作者被他们的专业组织告知其大部分研究可以排除审查,而事实上,大部分伦理审查委员会仍然无视或拒绝该声明,甚至有研究者因为没有遵守联邦法规而遭受各种警告或惩罚。^③

基于此,2005年11月罗森茨维格代表美国历史协会致信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主任伯纳德·希维切(Bernard Schwetz),希望澄清联邦政府有关口述历史研究的伦理审查政策。除重申口述历史不是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及其理由之外,他催促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尽快发布有关该问题的正式书面指南。而且,他还希望办公室能够将2003年9月22日政策声明纳入联邦法规并废除极易造成政策混乱的2003年10月30日备忘录。^④现有资料无法确定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是否答复罗森茨维格的来信,不过在2005年11月22日,卡罗姆曾发布电子邮件澄清该问题。^⑤此外,在2006年11月召开的美国医学科公共责任组织(Public Responsibility in Medicine and Research, PRIM&R)会议上,卡罗姆再度重申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在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上的政策立场。^⑥而从美国历史学界的反应来看,显然上述两次澄清并没有达成较为一致的意见,尤其是双方在“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普遍性知识’与‘系统性调查’等概念理解上存在差异,而且办公室坚持认为2003年10月30日备忘录与2003年9月22日政策声明并不冲突。美国历史协会工作人员也失望地表示“考虑到我们过去与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之间的沟通与协议的有限影响,我们的期望是相当有限的。”^⑦

的确如此,尽管以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为代表的专业组织仍然积极推动口述历史伦理审查制度的改革,可是其效果甚微。2007年10月26日,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就于1998年11月生效的联邦条例中符合伦理审查委员会“快速审查”的第五种研究类型的修改提议向社会征求书面意见,^⑧其中涉及口述历史问题的共有37份^⑨。而作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代表,该会执行主任阿尼塔·琼斯(Arnita Jones)于2007年12月20日致信办公室,该信不仅强烈反对第五种研究类型的修改意

① Robert B. Townsend and Mériam Belli, “Oral History and IRBs: Caution Urged as Rule Interpretations Vary Widel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December, 2004.

② Robert B. Townsend, Carl Ashley, Mériam Belli, Richard E. Bond and Elizabeth Fairhead, “Oral History and Review Boards: Little Gain and More Pain”,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February, 2006; Robert B. Townsend, “History Association Tracks Status of IRB Oversight”,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40, No. 1, 2006, p. 9

③ Bernadette McCauley, “An IRB at Work: A Personal Experienc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February, 2006.

④ Roy Rosenzweig, “Letter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HRP”,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February, 2006.

⑤ Michael A. Carome, “Clarification of OHRP’s Position on Oral History Information”, November 22, 2005.

⑥ E. Taylor Atkins, “Oral History and IRBs: An Update from the 2006 HRPP Conference”,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March, 2007.

⑦ Robert B. Townsend, Carl Ashley, Mériam Belli, Richard E. Bond, and Elizabeth Fairhead, “Oral History and Review Boards: Little Gain and More Pain”,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February, 2006.

⑧ “Feds Invite Comments on IRB Rules Affecting Oral History”,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41, No. 3, 2007, p. 8.

⑨ Zachary M. Schrag, ed., *Historians’ Comments to OHRP, October–December 2007*, February, 2008.

见,而且要求将口述历史从“快速审查”类型中删除并建议明确将口述历史排除在伦理审查之外。^①出于同样目的,2011年7月26日,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就“共同规则”的可能性修改向社会发布法规制定预告通知并征求广泛意见。^②在总共收到的1142份书面意见中,其中涉及口述历史伦理审查问题的大约占到12%,足见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关注程度。其中,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R. Grossman)和莉娜·本梅尔(Rina Benmayor)分别代表美国历史协会和口述历史协会于2011年10月致信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主任杰里·曼尼科夫(Jerry Menikoff)提出反馈意见,他们一致要求口述历史能够完全排除在“共同规则”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管与审查之外,并且对于联邦法规有关限制信息风险(information risk)的规定表示担心,认为该规定将对口述历史、档案保存与历史研究造成重大潜在伤害。^③上述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两次要求排除审查的理由同之前的主张基本相同,无非是强调“共同规则”并不适用于口述历史研究以及认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监管制度极大地违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侵犯学术自由。遗憾的是,这两次诉求没有得到健康与人类服务部或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的任何答复,甚至这两个机构原先提出的修改意见也没有正式公布与生效。^④

综上所述,在经过与联邦政府相关机构将近二十年的沟通与斡旋之后,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争取排除口述历史伦理审查的努力却陷入困境当中。

三、现实困境与选择

口述历史在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中并不是主流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可是口述历史学界在抵制伦理审查制度向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过度扩张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也受到其他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赞赏。^⑤可是,为什么其效果仍然相当有限,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联邦法规与政策的模糊性与矛盾性造成解读与具体实施的混乱。有学者指出“令人吃惊的是,一个简单的政府制定的概念模糊性(诸如‘普遍性知识’)能够导致政府、伦理审查委员会与专业协会之间的管辖冲突。”^⑥概念或政策的模糊性首先体现在“共同规则”对于何谓“研究”的定义,而“研究”定义本身是决定研究计划是否接受伦理审查的前提所在。由于该定义没有明确界定“普遍性知识”和“系统性调查”这两个核心概念,从而极易造成研究者、联邦监管机构与伦理审查委员会在理解与解读上的巨大差异,基本上是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合理性猜测与推论。^⑦正是如此,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以口述历史是为了“记录特定经历”、“解释特定过去”和“提供独特视

① “Arinita Jones’s Letter to the 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December 20, 2007; Robert B. Townsend, “Historians Get Rare Opportunity to Comment on Federal Policy on Oral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December 2007.

② David Brown, “U. S. Proposes Rule Changes for Human-Subject Research”,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23, 2011; Christopher Shea, “Historians and Human-Subjects Research”,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5, 2011.

③ “James R. Grossman’s Letter to Jerry Menikoff”, October 24, 2011; “Rina Benmayor’s Letter to Jerry Menikoff”, October 25, 2011.

④ Christopher Shea, “New Rules for Human-Subject Research Are Delayed and Debated”,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ovember 3, 2014.

⑤ Philip Hamburger, “The New Censorship: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pp. 352 – 354.

⑥ Ronald F. Whit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Mission Creep: The Common Rule, Social Science, and the Nanny State”, *The Independent Review*, Vol. 11, No. 3, 2007, pp. 553.

⑦ Caroline H. Bledsoe, Bruce Sherin, Adam G. Galinsky, Nathalia M. Headley, Carol A. Heimer, Erik Kjedaard, James Lindgren, John D. Miller, Michael E. Roloff and David H. Uttal, “Regulating Creativity: Research and Survival in the IRB Iron Cage”, pp. 609 – 610.

角”为由来强调它并不是为了获得联邦法规所规定的“普遍性知识”进而主张它不是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并因此可以排除伦理委员会的审查。可是在实践中,由于不同口述历史实践者在研究方法(生平式与主题式访谈)与研究目的上的差异,也无法排除有些研究者希望通过较为系统的口述历史访谈与研究来得出结论、为决策提供信息或总结发现结果,显然这些研究则带有获得某种“普遍性知识”的可能性。

而作为美国口述历史学界努力排除审查的主要成果,2003年9月22日政策声明本身在关键术语使用上也是模糊不清,即声明中的“大多数”和“一般而言”两个术语很难让研究者或伦理审查委员会判断哪些口述历史计划属于“非大多数”或“非一般”情况。不过,如上所述,真正造成该政策声明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参与讨论并同意发布的与政策声明存在明显冲突的2003年10月30日备忘录,该备忘录明确指出某些口述历史计划需要接受伦理审查。基于此,当时就有学者指出“我们发现口述历史计划监管仍然是相当不同的政策与程序的令人混淆的拼凑。”^①而就审查实践来看,绝大多数伦理审查委员会则倾向于赞同备忘录的指导原则。

联邦法规与政策的模糊性与矛盾性还体现在联邦监管机构自身的言行不一,即2004年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在启动 Belmont 口述历史计划(Belmont Oral History Project)时就没有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该计划由希维切主任在内的人类研究保护办公室工作人员对国家保护生物学与行为研究中的人类受试者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前成员与职员进行视频访谈,并将视频与抄本资料发布在办公室官方网站上。而且,部分访谈资料还被应用到一个纪录短片当中,用来纪念和评价《贝尔蒙特报告》(Belmont Report)发布25周年。^②针对学者的质疑与追问,办公室于2007年做出回应,坚决宣称该口述历史计划并不属于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因为它不是一项为了获得普遍性知识而进行的系统性调查。可是,有学者仍然强调该计划网站(标题为“Oral History Archive”)就像“一个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研究资料的信息库”,而且办公室利用部分访谈资料所制作的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为决策提供信息的目的。^③这些特征显然都符合2003年10月30日备忘录所提出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则,因而理论上需要接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可是当时办公室却没有采取任何相关程序。

第二,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风险规避思维导致它们宁愿在监管程度上犯错误,也不愿意直接放弃对某些研究类型的审查权。如上所述,“共同规则”本身只适用于那些由18个联邦机构执行或资助的研究计划,而事实上,绝大部分大学或研究机构会将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扩展到所有研究类型,即使它们没有获得上述联邦机构的资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模糊的联邦政策以及管理者避免潜在诉讼或负面报道的本能培养了一种日益扩大的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体制。^④

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审查口述历史的主要考虑是基于两个方面:给受访者可能造成的心理伤害与保持受访者隐私的需要。^⑤为避免心理伤害(甚至是人身危险),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访谈者不能提问那些潜在的敏感问题。而口述历史学界认为,作为开放式的口述历史访谈很难预见是否或何时

① Robert B. Townsend and Mériam Belli, “Oral History and IRBs: Caution Urged as Rule Interpretations Vary Widely”.

② 计划官方网站为 <http://www.hhs.gov/ohrp/archive/belmontArchive.html#histArchive2> [2015-08-02]。

③ Zachary M. Schrag, “‘Generalizabl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Review Blog*, January 10, 2007; Zachary M. Schrag, *Ethical Imperialism: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1965-2009*, p. 158.

④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Threaten Scholarly Work”,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40, No. 3, 2006, pp. 8-9.

⑤ Linda Shopes, “Negotiating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Perspectives on History*, March, 2007.

会涉及敏感主题;而且,与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研究中的人类受试者不同,作为具有高度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受访者能够自我权衡敏感主题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访谈者也会适当提醒受访者予以注意)。甚至有学者强调,根据传闻和科学证据显示,有关敏感主题或创伤经历的访谈并不总是造成伤害,而可能具有积极效果。^①至于隐私问题,伦理审查委员会要求受访者保持匿名(口述历史协会允许在极端情况下可以这样做),甚至要求在研究完成之后由研究者(受访者)保存资料或销毁它们。显然,这些做法都完全违背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目的,因为匿名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缺乏可信性,而且对于绝大部分受访者而言,他们都为自己的经历能够成为历史记录的一部分而感到自豪,因而希望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

基于此,美国历史协会指出,如果公开的话,访谈当中的某些信息可能会给受访者带来名誉或财产损失,甚至让他们面临民事或刑事责任。但是,历史学家的更为重要的责任在于追踪证据所指引的方向,并在其所有复杂性当中认识与理解过去,而不是保护受访者免受他们过去的错误或罪行的可能性影响。^②不过,在实践中,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口述历史计划涉及政治(社会)运动、内战(战争)、非法移民或创伤事件等敏感主题,同时也因为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得口述历史资料的网络传播与使用变得更为容易与便捷,这些因素都使得口述历史工作所面临的法律与伦理风险进一步加剧。当然,这些因素也直接导致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口述历史研究计划的审查程序与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

发生于2011年并持续至今的美国波士顿学院口述历史传票案(Boston College Oral History Subpoena Case)就令美国口述历史学界要求排除审查的努力蒙上阴影,它是美国现代口述史学有史以来有关法律与伦理问题的最为影响深远的法律诉讼事件。^③该传票案发生于2011年5月和8月,英国有关当局依据英美司法互助协议(Mutual Legal Assistance Treaty)通过美国司法部向波士顿学院分别发出两张传票,要求交出保存在该校伯恩斯图书馆(John J. Burns Library)的两位爱尔兰共和军前成员布兰登·休斯(Brendan Hughes)和多勒丝·普莱斯(Dolours Price)以及所有涉及1972年一位名叫珍·麦高伟(Jean McConville)的北爱尔兰妇女的绑架与谋杀信息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这些资料是完成于2001—2006年期间的“贝尔法斯特计划”(Belfast Project)的一部分,该计划由波士顿学院赞助和发起,旨在通过口述历史访谈来记录和保存那些参与长达30年的北爱冲突双方(共和派和忠诚派准军事组织)前军事成员的故事与经历。^④

该案涉及众多的口述历史法律与伦理争议,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波士顿学院被批评在计划初始阶段没有征求必要的法律建议和实施尽职的伦理审查与监管。显然,对于那些可能开展涉及危险或敏感主题研究的大学或机构管理者来说,该案可能会让他们提高警惕,并要求伦理审查委员会加强对相关研究的审查与监管力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大学或研究机构并不赞同要求排除口述历史审查的政策声明。

① Elana Newman, Edward A. Walker and Anne Gefland, "Assessing the Ethical Costs and Benefits of Trauma-Focused Research", *General Hospital Psychiatry*, Vol. 21, No. 3, 1999, pp. 187-196.

② "Arinita Jones's Letter to the Office for Human Research Protections", December 20, 2007.

③ "Oral Historians Express Concern about Boston College Subpoena",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Vol. 45, No. 2, 2011, pp. 9, 11.

④ Motion of the Trustees of Boston College to Quash Subpoenas, M. B. D. No. 11 - MC - 9107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June 7, 2011, pp. 1-5; Motion of the Trustees of Boston College to Quash New Subpoenas, M. B. D. No. 11 - MC - 9107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istrict of Massachusetts, August 17, 2011, p. 2.

第三 将口述历史定位为不是联邦法规所定义的“研究”类型降低了其学术性,从而造成口述历史学界内部在伦理审查问题上的分歧。如上所述,美国历史协会与口述历史协会为了将口述历史排除在审查之外,因而主张口述历史并不是“共同规则”所定义的研究类型,当然它们很清楚并不是刻意贬低口述历史本身的学术性。但是,这种策略却引起部分口述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阿特金斯就认为这是不明智和自掘坟墓。在他看来,任何希望在知名大学追求学术研究、终身教职或研究生学位的历史工作者都必须从事“研究”,即所谓的有助于获得普遍性(历史)知识的系统性调查。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从事的口述历史工作是没有经过审查的,将不能让他们获得期待的学术资历。^①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副主任马丁·米克尔(Martin Meeker)也指出“通过同意口述历史不能被定义为由诸如此类的资助机构所认定的研究类型,口述历史学家默认在学术层级体系中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相对于一些过度扩张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来说,口述历史访谈在大学中的历史上和现在仍然延续的边缘化对这个领域的当前发展和未来健康将带来更大风险。”^②

的确,作为美国二战后兴起的为数不多的兼具学术研究意义、社会激进议程与公共历史价值的研究方法与学科领域,口述历史尽管在后两个方面取得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力,可是其学术性仍有待学术界认可。^③显然,排除审查策略的确会影响口述历史的学术性与科学地位,甚至导致口述历史被其他领域的学者嘲笑为“非研究”(non-research)工作,这并不是口述历史工作者愿意看到的。

正是由于上述各种困境,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不断意识到联邦监管机构与伦理审查委员会根本不可能放弃审查权,即使符合豁免或排除条件,其决定权也属于伦理审查委员会而并非研究者。作为口述历史排除审查的主要倡导者,肖普斯也承认他们的倡导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而且她也悲观地表示“口述历史学家不太可能从联邦监管机构那里获得许多让步。”^④的确,希维切尽管承认更为清晰的政策指南可能有助于让伦理审查委员会不那么具有干预性,但是他仍然坚决主张在非医学研究中也需保护人类受试者免受任何危险。正如他所说“如果说不存在任何风险,我想那是天真的。”^⑤

众多学者提出,口述历史学界真正需要的是采取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抵制伦理审查委员会。其中最为关键的则是教育与协商,^⑥以期达成一种相互尊重与信任的和睦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与伦理审查委员会合作发展一套真正适合于口述历史的伦理审查政策与程序。

(作者杨祥银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325035)

(责任编辑: 董欣洁)

(责任校对: 李桂芝)

① E. Taylor Atkins, "Oral History and IRBs: An Update from the 2006 HRPP Conference".

② Martin Meeker, "The Berkeley Compromise: Oral History, Human Subjects, and the Meaning of 'Research'", p. 131.

③ 在大学终身教职评定中,很多口述历史工作者抱怨他们的工作被认为是并非有价值和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详细参阅 Clifford Kuhn, "Considering Oral History as Scholarship: Comments Welcome", *Public History Commons*, June 17, 2015.

④ Linda Shopes, "Oral History, Human Subjects, and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⑤ Patricia Cohen, "Ethics Panels Expand Grip, No Field Is Off Limits",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2007.

⑥ John A. Neuenschwander, *A Guide to Oral History and the Law*, p. 111.

historical study , which covered such basic areas as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 historical function , historical style , and history's rela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his new paradigm , the author argues , was not forsaken in the subsequent May Fourth era with the ris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school. Instead , he believes that Liang's ideas became developed and entrenched during the period. Having had more exposure to the changes of Western culture , Liang himself had modified his attitude toward the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But overall , he did not entirely change his position. Instead , he further developed his ideas of "new historiography ," turning it into one of the three major 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Complementing one another , Liang's "new historiography" was also equally significant as the "Historical Source" school and Marxist school in modern China.

"Composing" (zhuanshu) and "Recording" (jizhu) in Zhang Xuecheng's Historiography//
Zhang Yiguo

With respect to the origin of Zhang Xuecheng'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mposing" and "recording" in historical writing , many scholars believe that he expanded on Liu Zhiji's ideas on how contemporary records tend to be terse and later writings verbose. But in fact , the two differed in ideas and attitude. Liu was more referring to the two steps in historical writing whereas Zhang to two types of historians. Zhang's discussion received attention in modern times because by then the attitude toward historical sources had become changed. Yet modern scholars' distinction betwee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ources was not comparable to Zhang's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mposing" and "recording ," for phrases and ideas change over time as they are born in different intellectual context.

American Ethics Review Mechanism and the Study of Oral History//Yang Xiangyin

From the 1950s ,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began paying attention to and regulating ethical issues involving human subject research , for which it established a set of ethical review and regulatory mechanisms. Since the mid-1990s , oral history study , which requires interactive interviewing method and research based upon the oral memories of participants and eyewitnesses , has also been subject to the system of ethical review and regulation that was originally established for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es. Meanwhile , American oral historians have been trying to reform the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 they regard such mechanism as contrary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oral history study , such as academic freedom. They have strongly advocated that oral history be fully excluded from the ethical review process. However , because of the ambiguity of federal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nd risk-averse mindset of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 most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 careful in deciding whether or not a specific research project in oral history should go through a certain type of ethical review process or even avoid any ethical review mechanism.

On Keith Thomas' Historical Anthropology//Xie Yujun

Keith Thomas is an acclaimed British historian as well as a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new cultural history. Many of his works , such 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and *Man and the Natural World* are